

# 對「瀕危論」的幾點反駁

楊大利

王紹光、胡鞍鋼兩位先生合作研究大陸國家能力，先以報告的形式在中國科學院面世，於1993年夏末秋初得到多家外電青睞，可謂舉世矚目。這次兩位先生將該報告的主要論點在《二十一世紀》雜誌公開發表，現不揣淺陋，對王、胡兩位先生的文章獻上幾點評論<sup>①</sup>。首先，我先淺析王、胡一文修辭論辯(rhetoric)的方式，然後討論該文對數據處理的某些可商榷之處，並指出該文之結論論據不充分的方面。我希望能通過《二十一世紀》交換意見，促進對中國大陸政治經濟變遷的研究了解。

## 聳人聽聞的「瀕危論」

在《保守反動派的辯論法》一書中<sup>②</sup>，艾伯特·赫希曼教授縱觀二百年西方近代史，提出反對改革的人，一般不外乎採取三種辯論手段：即改革會產生負效應論、改革徒勞論和改革會導致倒退論。在該書倒數第二章，赫希曼筆鋒一轉，指出改革派的代表們也有他們自己的辯論手法，以說服讀者或聽眾。進步改革家們最喜歡用的辯論手法之一便是「瀕危論」(the imminent crisis thesis)：即必須採取某種改革以避免某種災難的發生。

毫無疑問，王紹光與胡鞍鋼先生是屬於後者。他們毫不掩飾他們寫此文及在中國科學院印行的更長的文本的目標是因為他們關心中國的前途，並引用《易經》中的話來強調他們的出發點：「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通讀該文的讀者不難看出，王、胡二人的用意在於「進諫」。

正是因為他們「進諫」的目標，因此，他們也脫不出赫希曼教授所講的販賣改革(reform-mongering)的手段，即極力強調政府收入減少的極度危險。如他們計算中央政府財政收入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時，說在中國該比重「跌幅之巨，在當今世界上，只比前南斯拉夫稍微遜色一點」。眾所周知，南斯拉夫已經分崩離析了。王、胡兩位先生在這篇不長的文章中，不惜筆墨，有七次重覆中國與南斯拉夫比較這一論點，其用意，無非是讓讀者與他們達到共鳴，認為「我們看到中國的情況與南斯拉夫極為接近」，中國目前的情況如繼續下去，也會步南斯拉夫の後塵。

對王、胡兩位先生來說，僅僅把中國與南斯拉夫比較還不夠，他們還提到國民黨中央政府1934年時的財政窘狀。更進一步，他們還利用大陸官員喜歡引用歷史，並了解中國明清時代中國歷史逐漸敗落的背景，將他們的辯論推向高潮。他們指出：「到明末、清末，雖然由各級政府徵收的賦稅有增無減，中央政府能支配的份額卻大為減少。……到這兩個朝代崩潰前夕，國家機器內部早已被蛀空，只剩下副嚇人的架子。外力稍微一推，便嘩啦啦塌成一堆廢墟。」

顯然，兩位先生寫這段話的目的，是把中共現狀與歷史上的這兩段時期進行類比。在這段話之前，他們寫道：「稍微回顧一下明末、清末的情形，便會發人深省」。這彷彿在對讀者說，你應該知道這些常識性的東西：如果不知道的話，那你簡直是太差勁了，不過，你應該相信我們這些專家所寫下的結論！

實際上，對於一般的讀者來說，大概早在讀到該文第二節末時，便應該已經佩服得五體投地了。到那時，作者們已經引入了有關國家汲取能力的五種不同的「等式」和一連串的數據。僅僅中國與南斯拉夫的比較，已至少提到了五次。於是，作者們不無自豪地寫道：「上面五個方面的比較以無可辯駁的數據證明，在資源動員和分配方面中國政府已變成了一個「弱政府」，中國的中央政府已變成了一個「弱中央」。……幾乎可以這樣說，在財政上中國政府已成了世界上最弱的政府，中國的中央政府已成了世界上最弱的中央」。

## 如何定義國家汲取能力

明眼人都知道，中國大陸改革的主旨之一便是改造大一統的所謂計劃體制，因而，隨着改革的深入，中央所控制的財力有所減少是預料之中的事情。王、胡兩位先生也是認同這一點的。其次，由於中央放權讓利，造成宏觀調控困難，這一點在大陸經濟學界也是有共識的。我本人也是認為中央相對財力減少，不利於某些只有中央才能做的事業，比如區域發展平衡問題<sup>③</sup>。但是，中國大陸國家能力真的會像兩位先生所描繪的那麼糟糕嗎？中國的中央政府真的（在財政上）已成為世界上最弱的中央了嗎？王、胡兩位先生真是那麼證據確鑿，無可辯駁麼？我看不見得。

首先，我們看王、胡一文是如何定義國家汲取能力的。該文文首一口氣列出五個所謂「等式」，這些等式其實不過是作者的定義而已。而兩位作者對國家汲取能力一下子提出五種不同的定義，似乎混淆了中央與國家的區別。如第(III)-(V)等式中實際衡量的是中央相對財力，但卻仍被視為國家汲取能力。於是，作者認為「地方政府掌握的資源越多，國家總的汲取能力下降得越厲害」，難道地方政府不屬於國家的組成部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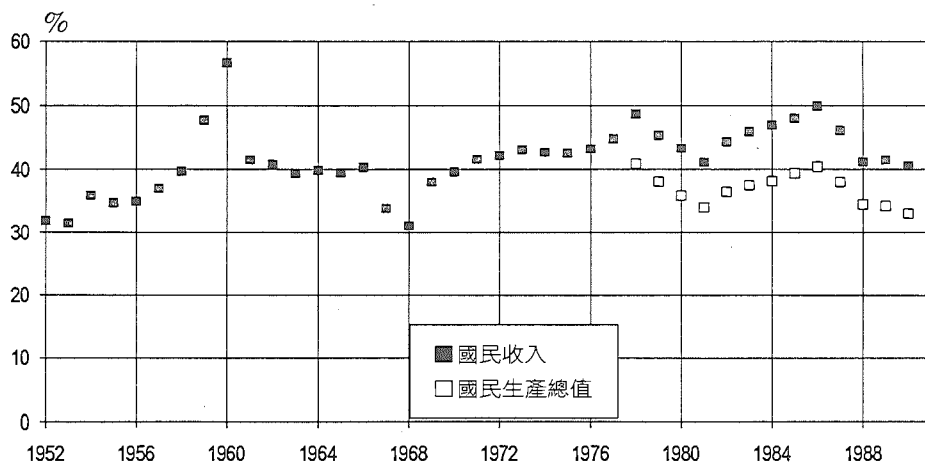
其次，王、胡一文運用數據的方式也有可以商榷之處。例如，該文表一把1978-89年這相當一段時間的「國家汲取能力」值算在一塊，從而使人不知道在80年代末，這一值到底是處於上升、還是下降趨勢。另外，有些數據，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作者也沒有明確交代。例如，該文有這樣一段重要的話，「如

採用國民生產總值作為式(I)的分母，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已從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2年的14.2%，跌了一半以上」。根據王、胡一文的第(I)、(II)式，財政收入應該包括中央及地方的預算內收入和預算外收入之和。根據1992年《中國統計年鑒》頁228，1978年中國財政收入應為 $1,121.12 + 347.11 = 1,468.23$ 億元，而當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為3,588.1億元，故上述比重在1978年應為40.9%。顯然，王、胡一文僅僅使用了預算內收入作為分子，故而結果偏小。

這樣基本的數據處理偶爾模糊，可以諒解，改正起來也不難。可作者對數據所作的引伸推斷，我這位讀者則不敢苟同。例如，作者引了上面的一句話，接下來便得出結論，認為「如果現行財政管理體制不變的話，預計中國財政收入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將在1995年跌至13.3%，在2000年跌至11.3%」。實際上，我們根據王、胡一文的定義，分別計算出1952至1991年間中國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和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值(見圖，黑色為用國民收入所計算出的數值，白色為用國民生產總值計算出的數值)。從該圖我們可看出，用國民收入所算出的國家汲取能力，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初不斷上升，直到大躍進崩潰，而回落到40%左右。文革大亂時期，該值曾降至接近30%，但文革後期又穩定在43%左右。毛去世後，該值上升，到1978年達到近40%，但80年代初的經濟調整又導致該值回落。可是後來經濟加速，該值又上升，在1986年達到50%。1987年以後，由於財政所依賴的大中型企業困難加劇，尤其是1989-91年經濟處於低潮期，使該值又下降到略大於40%。

總之，用政府財政收入／國民收入計算的國家汲取能力，雖然在1988年以後有所回落，但與歷史水平相比，僅僅略低一些，而且在1988年以後並未呈繼續下降趨勢！用王、胡一文的推演法，到二十一世紀某一年，中國大陸國家的汲取能力大概會變為零。

本人並不否認大陸中央所直接控制的相對財力有下降的趨勢，但把這一因



政府綜合收入佔國民收入和GNP的百分比

素看作中央調控能力減弱的最主要的因素，則令人難以信服。根據王、胡一文的表二，巴西在1989-90年可以說是在世界上來說，中央政府財力最強的國家之一，其中央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高達92%，而美國(20%)和印度尼西亞(16.6%)兩國的中央則是弱者。但眾所周知，實際情況則大相逕庭。

同樣，作者指出政府汲取能力嚴重下降導致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節不利，導致消費失控，投資失控。但作者避而不談中央幾乎集中了大部分財力時，同樣也發生過投資失控(如大躍進)和嚴重浪費(如大三線)，也沒有討論銀行體系混亂所能導致的消費、投資失控。然而，大陸許多經濟學者，例如薛暮橋先生，早在80年代中期便指出，「在一段時期內，舊的調節體制放鬆了，而新的調節機制由於缺乏經驗，還沒有完善地建立起來，以致發生一些失控現象是難於避免的。」因此，需要造就新的經濟調控體系。然而，王、胡兩位作者卻認為，「過去，中國政府曾以權力高度集中，中央調度自如、令行禁止而著稱於世。那是國家能力強的表現。」真是這樣嗎？那是甚麼時候的過去？

最有意思的是作者把大陸現狀與南斯拉夫和中國明末、清末所作的類比。一方面，作者說，「我們看到中國的情況與南斯拉夫極為接近。」但在同一段話裏，又說「今日的中國當然與明末、清末的中國很不一樣，與南斯拉夫的情況更不相同。」到底是接近，還是不同？讀到這裏，我真不知道王、胡一文到底是在說些甚麼了。

## 結 論

限於篇幅與時間，本文不免掛一漏萬，但可以得出以下的初步結論：王、胡一文，從政治上來說，可能給在十四屆三中全會前呼籲改革中國大陸財政體制的官員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從這一角度看來(如果你認為應加強中央的權勢的話)，該文是一篇有效的政論文。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該文亦抓住了眾所矚目的一個課題。但該文不僅對數據的推引有不謹慎之處，而且主旨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其結論似有聳人聽聞之嫌。願兩位作者能將研究深入下去，給讀者以更中肯的答案。

### 註釋

- ① 我對中央與地方關係比較詳細的評述：“Reform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將發表在David Goodman, Gerald Segal所編輯的一本書中。
- ② Albert Hirschman: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Perversity, Futility, and Jeopardy*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③ Dali Yang: “Patterns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2 (June 1990), pp. 230-57.